

坎坷曲折人生路

——
记新四军老战士邓毅生

○ 邓建芬

目 录

坎坷曲折人生路

苦难童年.....	(2)
曲折从军.....	(9)
亲历皖南事变.....	(12)
越 狱.....	(17)
历尽艰辛归怀抱.....	(23)
从渤海到武汉.....	(30)
“我们有话就想对你说”.....	(33)
清华园里的成年生.....	(36)
“东电”春秋.....	(38)
“文革”磨难.....	(41)
西子湖畔的岁月.....	(45)
历史是公允的.....	(46)

坎坷曲折人生路

——记新四军老战士邓毅生



9月伊始，龙年盛夏的酷热渐渐离去，秋风徐来，让人觉着一丝惬意。才开办公室的门放下包便接老干局的电话说，原副总理邓子恢的长子邓毅生已回到故里，并于近日将到党史室看望我们，担任他传记写作任务的我好一阵高兴，这是难得的采访机会。

8日上午10时，他来了，只身来了，是雇三轮摩托车来的，脚穿普通的老式皮鞋，身着已退成灰白的深色中山装，手提一个小布袋。我吃惊了，这与时下常闻目睹的警笛豪车、前呼后拥场面大相径庭。细细端详，眼前这位与共和国的硝烟战火相伴成长的厅级老前辈，饱经风霜的脸庞似乎刻写着邓副总理的诸多印记，言谈、举手投足亦与我耳闻的邓子恢同志没有两样。他亲切、和蔼、随和得就像一位慈祥可敬的老农民伯伯，却又不失知识老人的清气、儒雅。是的，他是中国农民运动先驱邓子恢的儿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同时又是个标准的“清华”学子。

苦难童年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华夏大地、军阀混战，大江南北、狼烟四起，国家蒙难、百姓流离。以拯救民族、人民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刚诞生不久，城市乡村诸多仁人志士纷纷加进了这股激流。本系书香之家，刚东渡日本回乡不久的邓子恢，目睹城乡处处满目疮痍，地方劣绅横行霸道，萌发了改造社会的新思想。他阅读《新青年》、《新潮》，结识进步人士陈赞雍等，研读《共产党宣言》、《向导》周刊，以龙岩白土（东肖）桐岗小学为基地，与章独奇、林仙亭等人组织“奇山书社”，创办《岩声》报，揭露社会黑暗，报道群众斗争，推广革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动荡岁月1922年8月邓毅生降生了，其时，父亲邓子恢既要教书养家糊口，又得忙于革命活动，小毅生的幼年是在母亲曹全地的呵护下长大的。当时，邓家的经济已经没落，祖父的去世，父亲因曾在江西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参股的江西庆昌和商号被当地查封，邓家的生计仅靠几亩自耕田，家庭经济入不敷出，小毅生的童年是在困窘中度过。

1927年，母亲把他送进邓子恢的母校龙岩白土桐岗小学念书，继承了祖辈的书香血统，小毅生特别勤奋好学，考试测验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才过了半年多的学习生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波及江西福建，其父邓子恢在江西崇义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辗转回到家乡，与郭滴人、陈庆隆等以白土为基地，宣传革命思想，筹办农会，发展农民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抗税、抗粮斗争。1928年3月领导发动了震惊闽西、轰动福建的“后田暴动”并组建农民游击队。暴动消息传到龙岩城，驻防龙岩的陈国辉部开始了对白土红军游击队的清剿，为了躲避敌

人的搜剿，邓毅生跟着母亲时而在家，时而躲藏于白土奇迈大山，学业亦被迫时断时续。

革命者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而革命者的亲人家属经历的磨难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白土暴动攻打龙岩失利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一批来不及隐蔽、转移的共产党员、进步群众遭到残酷的迫害，邓毅生几乎天天听大人们说，某某人又被陈国辉的地方民团抓捕，枪决。入夜，每每听到犬吠声，他总是从梦中被母亲叫醒拉着往后山跑。年幼的小毅生，从稍懂事开始便深深体味革命之艰辛。

惊恐的日子终于降临邓毅生家。1928年隆冬的一天，小毅生正与母亲在家，忽闻国民党陈国辉部要来白土抓邓子恢，在乡亲们的掩护下，邓毅生和母亲匆匆躲藏到邻居房内，陈国辉部很快包围邓家厝房，兵丁搜遍房内，一无所获，气急败坏，陈国辉命兵丁在他房内堆上一大把柴禾浇上煤油点燃后扬长而去。幸好那天没刮风，乡亲邻里帮忙扑灭，住房中只有父母卧房被烧毁，其母曹全地的陪嫁物品及卧室家当付之一炬。看着好端端的房子顷刻间化为灰烬，邓毅生幼小的心灵受到第一次撞击，然，他不理解，那些穿兵服的人为什么心那么狠。

卧室被烧后，本不富裕的邓家经济更加拮据，几乎靠他外婆接济度日，邓毅生的学业亦完全中断。不安中捱过了半年，更加艰难的磨难又来临了。1929年6月，国民党布置对中央及闽西苏区的第一次“三省会剿”，张贞部负责龙岩“剿共”，作为革命中心的白土首先被张贞占领。为躲避灾难，邓毅生跟着母亲往外婆家（红坊）暂住，仅躲过了三个月，就被红坊当地反动民团头目曹宝庆告发，小毅生、他母亲、外婆和出生仅两个月的妹妹一同被捕，作为重要人犯关在了张

贞师部(与龙岩孔庙相邻)兵房。这是个临时女囚室,房内阴暗潮湿,四人吃喝拉撒全在一个仅有八平方米的囚室内,时间稍长,囚室内充满阵阵恶臭。这是邓毅生第一次坐监房,看着那些端着枪来回走动的士兵,小毅生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担心哪一天,他们把妈妈带走。这一天到了,两个当官模样的敌人叫着母亲的名字,说是提审,还好将邓毅生也带上,审问开始了。

“姓名”。

“曹全地”。

“家住哪里?”

“白土、邓厝。”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因为我是邓子恢的妻子。”曹全地用龙岩话一字一板地继续说:“可我仅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拖老带小,目不识丁,能知道邓子恢做什么事吗?一人做事一人当,抓我们没管用。”听着母亲沉着老练的答话,小毅生打心里佩服母亲沉稳和勇气。曹全地的答话使提审的敌军官觉得榨不出什么油水,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未提审。

这期间,张贞师部有一位副官(闽南人),表情和蔼,不时来到囚室窗外和小毅生说话,常常把他带出囚室玩,有时还让小毅生带些食物回来给母亲和外婆吃。毅生是自由一些了,免去了长时间在囚室中的烦闷,可母亲和外婆心头却增加了许多惶惑和担忧,深怕毅生被人带去外地卖了,因此,在牢房里母亲反复教他记住自己家乡的地名、父母姓名等。

不幸之中有幸,经这位副官说情、疏通,毅生四人在囚房呆两个多月便被保释出狱了。事后才知道这位副官是父亲邓子恢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得他相助才逃脱了漫漫牢狱之灾。

邓毅生与母亲回到邓厝家，没过几个月的安稳日子。1929年11月，国民党第二次三省会剿又开始了，刘和鼎部奉命清剿龙岩，邓毅生家首当其冲成了目标。提前知道消息，曹全地带着小毅生离家隐藏起来，敌人逮不着人，兽性大发，放起一把大火，因刘和鼎派人围着焚烧，无人敢去救火，烈火不仅烧掉上次陈国辉烧后剩下的所有房间，还殃及邻里六七户宗亲。已是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忙于革命，不能也无法回家协助收拾被焚毁的家园，原本是富家出身的曹全地便挑起了重建家园、抚养子女的双重任务。家没了，要重建，田地要自耕，老少要生活，望着母亲坚毅的神情和干活的麻利劲，小毅生打心内涌起一股敬爱之情。卧室向大祖母借用一间，厨房用廊厅改建，农具重新置买，耕地耘田，曹全地从头学起，看见母亲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还得饲养家禽、做饭，小毅生只恨自己年龄太小无法替母亲分担一二。即便如此，在母亲呵护下，还是觉得幸福、愉快的，不曾想，更加艰难的日子还在后头。

陈国辉、张贞占领龙岩后，培植地方反动势力，组建民团、控制地方政权，实行白色恐怖，诸多革命群众被捕入狱，我党为保护群众，安排红军家属及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家属、革命群众离开家园转移至邻县苏维埃控制区，毅生跟着母亲开始了流浪的生活。当时，红白拉锯，时而在龙岩家中，时而辗转于上杭、永定、长汀，到底跑了多少路，住了几个村，他也记不清，常常才在一个村住下睡觉还没做完一个梦又被叫醒上路了。此间，让小毅生至今难以忘却的是：1931年夏，他们转至永定虎岗，其时，闽西“肃社党”事件正烈，住区周围经常听到惨叫和枪声，许多昨日还亲热地叫为叔叔的好同志，第二天便不见了。听大人们说，以前时常住在他家的林一株用机枪扫射自己的革命同志，他想，这个林叔叔以

往人挺好，现在怎么变得那么坏，自己人杀自己人，这是为什么？邓毅生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

1932年暮春，十九路军受命入闽“剿共”前夕，邓子恢已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他赴任时考虑到战乱将降临龙岩，曹全地又怀孕在身，还有小芳梅，万一要随红军转移，困难甚多，经父亲与母亲商量，决定先把毅生带去瑞金，住在财政部所在地的瑞金廖坪。那时，邓子恢工作极其繁忙，常要去中央苏区各县，毅生生活缺人照料，酷暑天染上痢疾，苏区遭蒋介石封锁，药品奇缺，病一天天严重起来。父亲没法，经与在瑞金经商的曹全地的母舅商量，便把毅生托养在他家，疾病才日见好转。

十九路军不满蒋介石出卖淞沪抗日，在福州宣布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形势一度缓和，邓子恢考虑到曹全地拖儿带女，还是返回家乡较好，所以派人把毅生送往长汀与曹全地会合（那时曹全地已经随红年到了长汀），而后一道回龙岩。动身至上杭境内获悉形势恶化，十九路军占领龙岩紧逼苏区，于是毅生母子三人经政府介绍到上杭的茶树下参加红军被服厂的工作。人生的磨难又一次袭来。这年隆冬，茶树下是个冰雪世界，毅生刚添了个弟弟，就在他弟弟出生的第八天夜里，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白军发现了红军的被服厂，乘夜色，出动一个连兵力突袭。当时，保卫工厂的红军不到一个班，工人们慌忙分散突围，曹全地背一个抱一个还得牵着毅生摸黑随大伙朝长汀转移。入夜，冷风袭来使人打颤，毅生跟着母亲跋山涉水、跌倒了爬起来再走，包袱掉了，鞋子丢了，脚划破了，全然不顾，走着走着，他们便掉了队，当时曹全地只有一个念头，摆脱敌人。整整走了一夜一昼，好不容易到了上杭长汀交界处，找一个四壁透风的破庙歇下。寒夜，四周漆黑、狂风呼啸似狼嚎，曹全地就

像母鸡护小鸡似的，将三个孩子拥在怀里。解放后，每每回首如烟往事，邓毅生怎么也忘不了那恐怖的夜晚，倍感母亲的伟大，坚忍。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的闽西南地区，政治风云如四季更迭，时而国民党占领，天空乌云笼罩，革命志士、革命群众无立锥之地，四处奔走；时而红军控制雨过天晴，苏维埃政权善待百姓，农民分田分地，喜笑颜开。1933年的长汀艳阳高照，金瓯一片，邓毅生母子在那里度过了轻松愉快的半年。12岁的他在省苏维埃政府总务处当勤务员，工作不累，能吃饱饭，个子长高了许多，也长了不少知识。但是，由于困难，苏区的难民吃不饱，毅生的弟弟生病，缺医少药，出生不到半年便夭折了，母亲的泪也流干了。平静的日子没有多久，国民党派兵攻打长汀红色根据地，邓毅生母子又匆匆转移江西瑞金。时又正值严冬，绵绵细雨夹着冰雪，盘山小路又滑又陡，稍不小心便摔一跤，每走一步都极艰难。到一地歇一晚，小毅生的脚冻成了小萝卜，次日上路，脚一着地便疼痛难忍，长汀至瑞金短短80华里整整走了三天。

在红都瑞金平稳度过七个月，严峻考验又来到了。1933年秋，由于党内“左倾”领导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面对蒋介石疯狂的第五次围剿，红军越打越少，连连失去瑞金周围的根据地，为保存力量，中央红军被迫离开瑞金，实施战略突围，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其时，邓子恢虽未北上长征，但亦长途转移，曹全地、邓毅生、邓芳梅无法随邓子恢同行，留在瑞金投靠亲戚隐蔽下来。11月，国民党三十六师占领瑞金，曹全地依靠瑞金的表哥（白皮红心的维持会长）庇护躲过了有惊无险的牢狱之苦，历经艰险，辗转回到龙岩老家。

回岩后的1935年，邓毅生恢复了中断三年多的学业，就

读于白土东黄小学，经历几年的奔波磨砺，小毅生更加珍惜学习时光，倍加勤奋刻苦，两学期成绩都在90多名同学中名列第一。

中央红军离开赣南、闽西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坚守闽西的地方游击队进行残酷清剿，地方反动势力遥相呼应，放火烧房，移民并村，保甲连坐，许多共产党人、革命群众陆续惨遭杀戮，同时牵连诸多基本群众，是为最黑暗的白色恐怖时期。作为红军头目家属的曹全地、邓毅生又一次成了重点抓捕对象。35年冬，白土区浙江籍伪区长金某，因其兄被我红坊游击队击毙，乘机疯狂报复，到处抓人，整个白土区来不及跑的红军家属全被抓了起来。那几日，曹全地正好带着孩子到红坊做客，金某扑了个空，便勒令邓厝村甲长交人，甲长无奈遂跑到红坊如实告诉曹全地，当时在场的亲戚都劝曹远离躲避，一致认为金某杀人成性，被他抓住凶多吉少；但曹认为这样势必牵累许多宗亲，于是，毅然决定自动投狱。当时的情景邓毅生记忆犹深：母亲在告别兄妹几人时欲哭无泪，恋恋不舍，好似一场生离死别，邓毅生心里明白，母亲倒不是怕死，而是打心里放心不下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儿女。有幸的是苍天照应好人，就在曹全地投狱后的次日，金区长因搜括地皮、中饱私囊被人告发，自顾不遐，慌忙卷款潜逃，原被捕者大都释放回家，邓家又躲过一劫。

然，曹全地深知，此次逃脱厄运纯是偶然，为保住邓家的根，她求小叔邓子鸣帮忙，于1936年夏将邓毅生送至广东始兴江口万太昌商店当学徒，从此，开始了周而复始的扫地，刷洗、灌开水、洗烟斗、搬杂物为生的学徒生涯，一晃就是两年。其时中国大地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曲折从军

华北告急！平津告急！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甚至掉转枪口打共产党。奉老蒋之命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刚走完万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1937年8月，我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江南地方红军及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遵照党的指示，我闽西地方游击队改编的抗日义勇军组建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在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率领下，从龙岩白土出发，北上皖南抗击日本侵略者。

国难当头，正在广东江口镇打工的邓毅生平第一次收到父亲邓子恢的来信，信中谈及闽西国共合作及北上抗日的情况，并告知目前家乡形势比较稳定，希望邓毅生速速离粤回岩，或继续念书，或参加新四军报效国家。

是受父亲邓子恢的影响，也受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爱国热情的感染，邓毅生毅然决定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但因种种原因，当时没能来得及随父亲一同北上。

冷冷清清地度过了1939年春节，邓毅生便依依告别慈爱的母亲，与老师张一坚、表哥张振林、表叔张占云一同到后田新四军二支队闽西留守处开具了新四军军用通行证，离岩上路，前往皖南。当日乘车经连城到永安，其时，永安乃国民党福建省临时省会，军警盘查极严，他们一行四人刚住进旅社，军警便以查夜为名盘问，出示了军用通行证算是没事。不料，过了几小时，宪兵又来了，还是查看他们的通行

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细细看了他们的通行证后说:“军用通行证不假,但持证者应该是军人,是军人就必须按规定穿军人制服、佩带臂章、军容整齐,像你们这样的百姓装束持军人通行证有辱我军人尊严,没收了!”四人都是初次出远门,缺乏应变能力,加之,当时蒋介石表面答应国共合作抗战,实则消极抗日,暗中反共,他们没被扣押算是万幸。于是,次日只得购票乘车返回龙岩。

人虽然返回家乡,但邓毅生投军报效国家的愿望没有改变。5月,他又与叔叔邓子鸣及大池的吴不忧结伴动身再往皖南。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不光开好军用通行证,还向二支队留守处要了三套军装、胸章、臂章,认真装饰一番,俨然一副军人气派,一路顺利多了,畅通无阻,安全到达安徽威坪。威坪是通往新四军军部的必经前沿,往北是泾县新四军的集结地,往南是屯溪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只见持枪的、整队的,投军的、还有便衣警探,人流穿梭往来,很有战场前沿基地的气氛。

一行三人在威坪吃罢午饭,正欲登车前去泾县,两个宪兵过来拦住,一个当头的问:

“证件”!

叔叔邓子鸣赶紧递上三人的军用通行证。

“介绍信”那个头说

“没……”叔叔欲言又止

“留下!”那个头命令似地说。正当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位大军官模样的人过来了,他接过通行证看了看,就向宪兵挥挥手大声说:“我们的人,放行吧!”宪兵点点头,还向这位军官行礼。“顺路,上我的车!”他们三人深感庆幸遇见好人了,赶紧爬上汽车,上了车才知他是新四军叶挺军长

的副官。又一回有惊无险。

到了新四军军部，就如回到了家，邓毅生感到温暖、新鲜，还见到陈兰母亲。稍稍休息几日后，他被分配到军教导队青年队。说是青年队，实则是“小鬼队”，战士们不满18岁，大都是烈士遗孤及苏浙皖投奔新四军的青少年。大敌在前，战场在即，也没有一点特殊，一进队，开始了严格的短期军事训练。童年邓毅生虽历经磨难，然，正规的军旅训练还是第一次。早上天一擦亮起床号就响起，五分钟完成穿衣、整装、打背包，站好队集合；20分钟洗漱，吃早饭。上午四节课学习军事、文化知识，说是上课其实没课桌凳，没黑板，背包当椅、膝盖为桌，教员口头讲述。在家几度失学的邓毅生尤为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认真听课，仔细笔记，时间不长，还真学了不少东西。下午是军事训练，他就比较吃力，虽然已有17岁，但是个子小，体质弱，动作总不那么规范到位，邓毅生非常刻苦，决不拖队员的后腿。晚上持枪放哨，无疑又是个考验，而想到家仇国耻，他就什么都不怕了。

亲历皖南事变

两个月教导队青年队训练结束后，邓毅生调至新四军军部机要科，又一个月机要业务训练，便开始了他的机要工作生涯。

邓毅生分至机要科二组，当时机要科长童世杰和金涛，二组组长李群。机要科的工作是负责军部来往电报的密码翻译，此项工作要求有机密性、准确性、时效性，邓毅生在机要科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工作很快上路，加上勤勉吃苦，办事快捷准确，很得同志们的夸奖。次年2月（1940年）邓毅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全国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调整对华侵略政策，收缩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规模进攻，将大量兵力投向敌后战场，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游击队担负起主要的抗战任务，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4月，正在后方休整的新四军直属第三团受命调往何家湾抗日前线，邓毅生亦从军部机要科调至三团任机要员。6月，日寇组织对皖南地区的大扫荡，三团受命在何家湾阻击敌人，邓毅生随三团团长黄火星在前沿阵地，第一次真刀真枪上战场，心里还有点发毛，当看到黄团长不畏数倍于己的强大敌人，沉着指挥，心内踏实了许多。日军开始进攻了，只见日本兵排着三路纵队往我方阵地上冲，二千米、一千米，直到离我军500米时，黄团长一声令下“打！”我方步枪、机枪同时开火，敌人才散开，迂回前进。战斗持续十五分钟后，敌方发现新四军人数少、武器差，于是迅速集结靠拢，以三千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包抄过来，由于我军处在掩蔽的高处，敌

人很难攻上来，直至天黑，日军怕吃亏，才向西从青阳、贵池方向离去。此次战斗，保卫了军部，我新四军三团没重大伤亡，也让邓毅生初尝战争滋味。

7月，为了粉碎日军的扫荡，新四军采取分散隐蔽，择时出击的办法。江南三个支队，第一、二支队除分出一个团留在皖南保卫军部外，其余调往苏南一带，第三支队则调一个团支援苏南外，剩余部队担负起皖南阻击日军的主要任务。此时，邓毅生从三团调往三支队任机要股长。

9月下旬，日寇对我皖南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秋季万人攻势，约有五千人的一路日军向三支队驻防地三条冲一带发起攻击，当时支队司令部机关只有一个特务营和后勤人员，敌人直扑司令部驻地。不巧，那晚天特黑，哨兵无法看清敌人，待发现敌情已迟了，只得鸣枪报警，邓毅生随支队司令部仓促撤离，刚从村北方向撤出，敌人就已从村南攻入，好险哪！后来，在特务营掩护下，司令部从水龙山向铜陵地界转移。正是由于匆忙撤离，一部分工作人员失去联系，他们撤至水龙山附近时遭遇敌人，一阵激战之后，三位女同志掉队，落入敌手，顽强的新四军女战士为不遭日军污辱、施暴，毅然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其情景令在场不远的日军曹长情不自禁地大声赞叹。三支队转移至安全地后，专门为三位女英烈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经此，少年邓毅生想了很多，想到母亲，想到外婆，想到家乡闽西苏区诸多同样壮烈的姐妹，深觉中国女性之伟大。

随着日军对华策略的改变，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由消极抗日转向积极反共。按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以1939年12月包围我陕甘宁边区为开端，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在保卫国

家主权,反击日寇侵略为任务的大前提下,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有节制地对国民党的挑衅进行必要反击,而国民党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弱小可欺,于五届七中全会上制订新的反共计划,打算将打击重点定在华中地区。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参谋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诬说新四军在江南破坏抗战,并强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之内开赴黄河以北,结集待命。朱总司令、彭副司令、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联名于11月7日向国民党发出通电,一方面驳斥国民党的诬蔑,揭露其阴谋,另一方面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答应将驻扎皖南的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

新四军信守诺言,邓毅生所在的第三支队为了军部北撤,于11月底开始了渡江北上的准备工作。可谁知,这是老蒋反共消灭新四军的一个巨大圈套,正是这个圈套招致我皖南新四军的灭顶之灾,也使只是新四军中的一个小小机要股长的邓毅生成了国民党上饶集中营的一个囚徒,给他人生之路徒增了太多的劫难。

邓毅生清楚地记得,12月下旬的一天,张正坤司令员从军部开会回来,立即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讨论北上计划。三天后接到军部命令,要三支队于1941年元旦那天赶到云岭军部待命开拔。当时军部制定的行动计划是:分三路北上,左路为一支队,中路是二支队及军部直属队,右路是三支队及军部特务团。

岂知,新四军在按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部的命令调军北上的同时,蒋介石也在暗中下令调兵遣将,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调八个师近八万兵力部署在皖南及苏皖赣交

界地，装好口袋等着袭击。

就在新四军按计划准备从皖南渡江北去时，发现日军突然加强对长江沿岸的军事巡逻，并突击搜缴长江北岸的民用船只，原来新四军为渡江筹集的船只全被掳走。事后才知道，此乃蒋介石为防止我军快速渡江，遂把新四军渡江北上的消息用电台公开播出，实则告知日军，行使借刀杀人之计，使新四军无法如期渡江北上，然后好找借口说新四军违抗军令堂而皇之举兵剿灭。三支队行军计划作了调整，右路为特务营，五团改为中路殿后，部队从章家渡的青弋江渡河。时值阴雨绵绵，泥泞路滑、行动极其缓慢，区区百来里走了四天才到达指定的茂林地区，已是人疲马乏，军部命令原地休整。元月6日，中路军才缓缓向旌德方向启程，部队到达丕岑，敌上官云湘的第40师已在丕岑通往星潭的路上埋伏阻击，丕岑地势险要、极易防守，我军与敌第40师一个加强排激战数小时，敌人便被我新二支队先头部队击溃退至星潭。

眼见形势危急，军部召开战场紧急会议，议决如何迅速摆脱敌人。叶挺军长认为：当务之急是不惜代价组织优势兵力攻破国民党军的星潭封锁线，向江南突围，这是有希望的生存线。项英则认为这样做牺牲太大，不如另找突围路线，相持不下，拖延许久。至傍晚才仓促决定军部所属及二、三支队的部分部队从星潭方向折回。那时，三支队正在丕岑待命，接令后变后卫为先头部队向高岑方向突围，因情势危急，行动仓促、加之山路崎岖，支队司令部的电台连驮马一同坠入悬崖，电台被摔成碎片，没了电台，邓毅生随身带的密码也就失去作用，于是请示张正坤司令后，立即将密码销毁。三支队突围至高岑便遭到了几倍于己的敌军伏击，受损